

毛泽东亲笔改定《祝上海解放》

□ 吴海勇

1949年，是中华民族根本扭转百年屈辱没落命运的历史转折之年。经过13天的鏖战，解放军突入上海市区；在中共上海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协助下，又经过5月25日至27日这三天最后的奋战，使远东第一大都会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5月29日，毛泽东拿到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从头至尾仔细审阅修改，当天发出。翌日，题为《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社论在《人民日报》刊载，5月31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转发，后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改稿”篇目。细读毛泽东这篇审改稿的复制件，参考相关革命文献，对于当年上海解放的历史意义应当有更深刻感悟。

《祝上海解放》共由4个自然段组成，全篇1800余字。开篇在总括一句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上海解放而欢呼后，随即展开原因分析：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新华社社论指

出，正是“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对上海解放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归结起来，上海解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标志。

社论第二段溯及上海的历史与既往，既是对以上两大原因分析的补充说明，同时又是对这座“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城市历史内涵的深度阐发。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窃、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接下来社论中的这句话很重要，它明确了上海的历史定位：“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郑重宣告上海是党的诞生地。社论进一步指出，在“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正因为革命力量在上海不断发展壮大，这既使这座城市无愧于“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的称誉，又使文章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上海的

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社论同时关注“上海解放以后”的问题，指出“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社论驳斥“中国革命的敌人”对中国人民“无法管理”上海的恐吓，在正视存在困难的同时，宣示：“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困难是“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在关注上海解放对全国的意义的同时，社论在最后一段重点阐述了上海解放的世界意义，“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这既与篇首起句照应，又进而再度表明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态度。社论详引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表示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重申“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否则，中国人民即视之为“不友善态度”。社论最后总结说，“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祝上海解放》实际上开创了新华社社论的新范式。它不注重战况与战果的介绍，而侧重从城市的历史与定位中寻求其解放的意义与国际影响。

《祝上海解放》审改稿共5页，皆是纵行书写、由右向左排列。文稿以蓝色字为主体，另有红、黑两色修改字迹。据《毛泽东年谱》可知，该社论最后一句为毛泽东所加，根据此处修改的字迹与墨色可锁定《祝上海解放》文稿的其他修改内容。据有关统计，毛泽东对此文的修改共8处、136字。然而，细观文稿修改痕迹，其中蕴含了更多的历史信息。

毛泽东修改所用黑笔，较胡乔木涂黑之处明显要淡。循此淡黑墨笔，首先可见题名被黑笔圈删两处。原题名“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庆”字与“的伟大胜利”五字一并删略。胡乔木的原题与庆祝济南解放的社论同一句式，此后撰写的祝贺广州解放的社论也以“庆祝”二字领起题名，而祝贺上海解放的社论经此一改，显得特异标新，尤具毛泽东文字

风范。毛泽东在1942年11月6日曾发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也是“祝”字体题目。

就社论主体内容而言，毛泽东作较大增写的主要有以下四处。

其一，“在上海、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所举的诸城中，于“上海”与“汉口”之间加上“南京、杭州、九江、南昌”四城，解放的城市数量增加，而排序仍以上海领起，并不以城市解放时间排先后，这既彰显了该社论的主题，也折射出上海在领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在“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后，加写了一个长句：“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强化预警作用。

其三，在详引李涛将军声明引文后，补充说明了一句：“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进一步明确是非判断。

最后，便是文末加写的一句：“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云云，以衔接原稿的结句：“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两相对比，文章一反一正语意更加周全，文章也因为最后的正面表达而愈显义正词严。

另有个别增改之处，主要是为了增强文章的明白晓畅与行文之简洁。

此外，审改稿题目前有一行蓝墨水字批示：“译出发十二时送出”，可见该文系当日发出；首页上侧有蓝墨水横书“1852”，当是该文改定后的字数，这两处字迹应是出自别人之手。文稿还有醒目的红笔痕迹，字号较大，题名前的发电批示上写有“电讯”两个红字，删去的题名，用红笔复圈再加确定；每页上侧还用红笔依次写上“一、”“二、”“三、”“四、”“五、完”，显然是给文稿编页码。从红字对毛泽东最后增补一句的修改（“他们”之“他”改为“它”，以与同句前文所用的代词保持一致）来看，执红笔者还承担着校稿的职责。《祝上海解放》文稿红蓝黑三色笔迹交错其上，凝结着几多心血。

（摘自2019年5月27日《上观新闻》，原标题为《毛泽东亲笔改定的〈祝上海解放〉，透露出哪些重要历史信息》）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朱德始终不忘初心，心系人民，艰苦朴素。

1937年，朱德率部前往抗日前线。当得知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生活非常困苦后，朱德不得已向自己的老同学戴与龄写信求援。11月29日，他在给戴与龄的信中说：“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1946年11月，在朱德60岁生日之际，董必武从南京给他寄来两首祝寿诗。朱德依原韵，和了两首。其中两句赞扬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其实，朱德自己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

（摘自2019年6月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朱德的三封家书》）

朱德的信

□ 左智勇



“红小鬼”留给母亲的一张布币

□ 何志文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听说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很多红军战士的家属都来部队看望，这其中，就有杨世才的母亲。见到儿子后，她劝年幼的儿子跟她回家，但杨世才坚决地拒绝了母亲的要求。他告诉母亲：我要革命到底，坚决不跟你回去。看到儿子决心已定，她也就不再勉强。母亲临走的时候，杨世才把一张在革命根据地使用的三串的布票子交给母亲，让她做回家用的路费。自此母子二人便失去了联系。

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世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家人。由于参加长征时只有12岁，他也不知道他的家乡究竟是四川省的哪个地方，后来通过熟人，才知道他的家乡是四川省内江市一个叫楠木寺的村子。就这样，离家多年的杨世才跟家人取得了联系。1950

年12月，杨世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杨世才的母亲见到儿子后，激动万分，她从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取出一个竹筒，里面藏着的，正是杨世才长征出发前留给她的那张布币。原来，杨世才离开后，她没舍得用掉这个布币，而是把它当作儿子参加红军的纪念品留了下来。国民党军来了后，她怕受牵连，就把布币放在竹筒里，藏在了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10多年来，一想儿子，她就把这个布币拿出来看看，一解对儿子的思念之情，看完之后又藏起来。没想到，10多年后，她终于盼到了儿子回来的那一天。

后来，杨世才将这件饱含着母子亲情的珍贵布币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自2016年第10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原标题为《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生命之歌

□ 贺捷生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19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的行动，从九十月份就开始准备了。我母亲蹇先任正怀着我临产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敌人会用百倍的疯狂来报复，苏区将面临一场浩劫。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询问我母亲的信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生。11月1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赶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父亲长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极为高兴。刚好前线打了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胡须扎醒了，可能那时候的我，把他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哇哇地大哭起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天天盼着听你这小毛毛的哭声呢！这一下可好了！你哭出来了！喊出来了！好哇！”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得的一场胜利，父亲、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肖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

吧。”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我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为了戎马倥偬的母亲。部队长征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还是忍痛割舍？

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走得很快，要越过千山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起走，留给你抚养，好吧？！”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接。父亲着急了，亲自去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走了。

父亲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他是怕我们连累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么亲近的亲戚都躲起来了，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多辛苦些了。”这时候，我正在哭，母亲把我抱起说：“别哭了，再辛苦我也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多远！无论……”

当时，部队为了为长征，进行了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走，路上遇到合适的

人家再送人吧。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的初生女儿生别离。

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上摇晃，涌起的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指挥部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杈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我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随着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一宿营地，她就抱着我四处找奶。我的哭声把老乡们都引来了，老乡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无数位妈妈给过我奶水。爸爸妈妈说我吃过千家奶，这是名副其实的千家奶啊！

那时怪不怪，父母和任弼时、肖克、王震、卢冬生、贺炳炎、贺彪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对我的哭泣不仅不厌烦，反而都愿意听。一旦我不哭了，他们反倒担心。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了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和蛋清和泥糊在我的肚脐上。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不哭的我又哭起来，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才舒心地笑了。父母盼我哭，可有时他们又怕我哭。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军，母亲很紧张，紧张地用奶头堵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得没气了，仔细一看，我在母亲胸前的布里里酣睡呢。

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父亲把我放进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里。他骑马冲过敌人封锁线后，却把我丢了，我的哭声让红军战士们发现了我，他们见我用手衣包着，猜想是红军的孩子，就抱着我行军，后来，辗转地把我送到父母手里。但这个故事父母都不承认，都说没把我丢过，而贺炳炎却一口咬定是真的。我想，这故事可能是真的，父母不想承认是觉得我这娃儿一出生就历经了世人都难以经受的磨难，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得

太多吧！

过雪山时，母亲背着我，当她千辛万苦翻过雪山之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也激动得哭了。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雪山没夺走你！我的命大啊！在那次，我15岁的舅舅蹇先超就牺牲在寒冷的雪山上。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把干粮分给了弄丢干粮的女战士马忆湘（当时她才十二三岁），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哇哇直哭。一个警卫员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面粉，搅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地止住。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由于行走在红四方面军的后面，野菜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许多人因为吃了不知名的野菜都中了毒。为此，父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母亲就把试吃过的野菜，捣成菜泥喂我。野菜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一次次吐出来，母亲就一次次再喂。

长征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只好带着走。看来我是因祸得福呀！如果我是个健健康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我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宿营

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我没了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女孩。”也许真的是我命大，三天后，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给了全军一个惊奇。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都愿听到你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安，就是欣慰啊！就听不到你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还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力气，就对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不如猫的叫声大呢。”当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瓷缸炖羊肉汤喂我。慢慢地，我能站起来了。

1950年，当我在重庆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14岁的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就是你的哭声……”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路哭声，也是我的生命之歌。

（摘自2019年第3期《青海党的生活》）

